

世界文明史

卷七 理性开始时代

【美】威尔·杜兰特

東方出版社

(五) 滚 石

膀胱结石比法国的战事更加困扰着蒙田。1580年，在他的《散文》初版后不久，他就启程作了一次全面性的西欧之游，一方面固是为了看看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广求医术，以减轻一直缠绕着他的“腹痛”(Colic)(他自己称的)。他留下他的妻子看管财产，却带着他的弟弟和一位内弟埃斯迪萨克(Estissac)男爵；此外他还带着一位秘书，替他笔录部分的旅行日志，加上一些服侍和驾车的家仆。他这一行所作的记述都很简短，以致蒙田宁可留作纪念，也不拿出来出版。他将它们藏在箱底，一直到他死后178年才被发现。

他们这一批人首先来到了巴黎。在这里，这位骄傲的作家，将他的《散文》的复本呈献给亨利三世，而后他们很顺利地到达布隆比利(Plombières)。在这儿，蒙田在9天当中，每天喝下了两夸特(Quart)的药水，才痛苦地除去了一些小的结石。^⑧后来，他们经过洛林到了瑞士，“当他看到了这个国家的自由与美好的政府后，他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第三者的日记曾如此的记载着。^⑨他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取了药水后，进入了德国。他不但参加天主教的仪式，还参加加尔文教与路德教派的礼拜式，他和新教的牧师讨论神学，他提到一位路德派的教士，发誓宁可做一千次的弥撒，也不参与加尔文的教会^⑩——因为加尔文教派否定圣餐中有基督肉体的存在。当进入蒂罗尔(Tirol)时，他比卢梭更早发现了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经由因斯布鲁克，他们登上了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这时蒙田又除去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结石。而后，他们经过了特兰托、维罗那、维琴察、帕多瓦到威尼斯，在这里，他又将“两块大的结石”投入大运河(Grand Canal)中。他认为这个城市并不如他想像中的美丽，娼妓也不如想像中的标致。到达费拉拉(根据《散文》而非根据日记所说)后，他拜访了发疯的塔索；又去了博洛尼亚及佛罗伦萨，在这儿，阿尔诺河(Arno)接受了他的“两块结石，及一些小结石”。^⑪经过了锡耶纳到了罗马，他又“除去了一块大

如松果的结石”。^⑭所有的这些分泌物加起来，应该足够构成一个美丽的角锥了吧。

在罗马他访问了犹太教的会堂，亲眼见到了割礼，与犹太教的牧师谈论他们的宗教仪式。他更和罗马的娼妓交换哲学观。他不像司汤达 (Stendhal) 所说的丝毫不懂罗马的艺术。^⑮日复一日，他徘徊于古迹之间，从不停止对它们的伟大发出赞叹之声。最重要的，他还拜访了格列高利十三世。就如所有教会的子民一般，蒙田亲吻了罗马教宗的足趾，教宗还特地亲切地将足提起来，给予蒙田方便。^⑯在这同时，掌理关税的官员，发现了《散文》的复本，他们把它送到宗教裁判所去审理。蒙田被召唤到圣殿去，受到恳切的劝告，他们告诉他，有些章句确是充满了邪说异端，问他在未来的版本中会不会改变或删除它们呢？他作了保证，“我使他们对我非常满意”。事实上，他们还邀请他到罗马住下（他将他的保证置之脑后，所以在1676年，他的书被列入天主教的禁书目录中）。也许是为了表现他的诚心，他特地横渡了意大利，在洛雷托的圣母寺前供奉了一块许愿的匾额。然后他再度横过亚平宁山脉 (The Apennines) 到卢加拿取药水。

1581年9月，传来他被选为波尔多市长的消息。他推辞不就，但亨利三世命他接受，如此一来，由他父亲遗留下来为公服务的传统得以维持下去。他从容取道回法国，一直到11月30日，才回到了17个月不见的庄园。

市长的职务很轻松，除了荣誉以外并没有薪给。他做得成功，所以在1583年8月时，再度蝉联了两年的市长。1584年12月，那瓦尔的亨利携同情妇与40个随从去拜访他，这位未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就睡在这位哲学家的床上。当他第二任期将届满的时候，瘟疫袭击了波尔多，蒙田和所有的行政官一样，离开了城市，退避在乡间。1585年7月30日，他将印信交与继任者，退休在家。

那时他虽然只有52岁，但他的结石定期的侵扰着他，有时甚至几天无法排泄。^⑰1588年年初，他的健康还允许他做第三次的巴黎之

行，在那里，他被视为亨利三世的拥护者，而被当时统治首都的联盟党（The League）拘捕，拘禁在巴士底狱（7月10日），但同一天晚上就由凯萨琳·美第奇说项保出。10月他参加了在布卢瓦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及时返回波尔多而避开了吉斯公爵被刺后所引起亨利三世盛衰的风波。

在他最后也是最好的一篇论文《经验论》（Of Experience）中，他曾描述了他身体的衰退情形，举个例子来说，他的牙痛已经到了那种所谓“自然而然延续着”的地步，^⑩但他却能忍受着它的“煎熬”而没有一点痛苦。他的一生，大致是如他所计划的一样度过，因此他骄傲地写道：“回顾以往，你将很难找到一打曾过着固定且有计划生活的人，而这种生活正是智慧的象征。”^⑪当他被告以大限将至的时候，他把他的管家及遗产继承人集合到他的周围，并且亲自将遗嘱中所列的财物分给他们，他虔诚地接受教会的送终赋，就好像他从不曾写过一句怀疑的话一般。1592年9月13日，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59岁。

蒙田的思想影响及于4大洲达3个世纪，黎塞留曾高兴地接受了由古尔娜（Gournay）小姐所发行的最后一版《散文》（The Essays）。他的朋友兼弟子沙朗早在1603年就把蒙田的论文系统化，使它成为一正式而有条理的哲学。约翰·弗洛里欧（John Florio）且将它译为英文名著，但他做得并不怎么好，他给原著的简洁涂上了累赘冗长的色彩。莎士比亚可能看过他的译本，并从这本书出发，形成他伟大悲剧中怀疑的色彩，这一点我们已提到过。而且当本·琼森（Ben Jonson）批评英国作家剽窃蒙田思想的时候，相信他心中已想到莎士比亚。^⑫培根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笛卡尔也深深感觉到蒙田所予他对宇宙怀疑的启发。帕斯卡为了逃避蒙田的怀疑，以拯救自己的信仰，甚且濒于发疯边缘。以蒙田为根源，先后出了培尔（Bayle）、沃夫纳格（Vauvenargues）、卢梭、狄德罗（Diderot）、伏尔泰——其中卢梭受礼于他的《自白》（Confessions）及《教育论》（Of Education）、《食人族》（Of Cannibals）两篇论文，伏尔泰则接受了所有其他的。培尔是启蒙运动之父，而蒙田则是祖父。迪凡德

(Deffand)夫人，一位有锐利眼光的女人，她亟欲“除了蒙田以外，放把火烧掉哲学家们所有广博的作品，因为他是这些哲学家之父”。^⑩蒙田还将心理分析带进了法国文学的领域，从高乃依和莫里哀、拉罗什富科和拉·布鲁耶雷 (La Bruyère)，到安纳托尔·弗兰西 (Anatole France) 都深受他的影响。梭罗博采这位哲人的智慧，爱默生 (Emerson) 在写他自己的《论文集》前，将自己沐浴在他的思想中。读蒙田的作品，就如同读 18 世纪前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你将会发现好像昨天才写成一样。

世人很久以来就认识并原谅了蒙田的过错，那些过错很多他都已经自己承认过，以致于他几乎挖空了评论家的心思。他对自己的聒聒不休与自负有深刻的了解。有时我们不免对他作品上的引文感到厌烦，且可能陷入了马勒伯朗士 (Malebranche) 对《散文》所作不公正的批评：“一叠除了稗官野史、小故事、隽语、诗、箴言外，一无所有的东西……而且确是如此。”^⑪无可讳言的，蒙田使自己的作品紊乱无章，因而减少了紧密性和扼要性。他在成百的问题中自相矛盾，他说事情的正面和反面，所以他注定是对的。对宇宙的怀疑，在某方面麻痹了人心，它虽然使我们免于宗教的杀人，却使我们意志消沉，失去了扬起生命之帆的原动力。我们被帕斯卡不顾一切维护信仰所感动的可能性要比被毫无信仰的蒙田所感动者为大。

我们万不可陷自己于此不公的评论中，它将使我们失去对这位多言哲学家的《欢笑的学习》(gaya ciencia) 和不愿沉默的《闲谈兴趣》(allegro pensieroso)。在那里我们还能够找到如此生动的智慧与幽默的结晶？智慧与幽默二者之间有微妙的相同点，因为二者可能都是透视万事万物的结果，蒙田集两项特质于一身，他的多言的缺点，为诙谐与明晰所补救；在他的作品中，没有陈腐的字句，更没有华而不实荒谬绝伦的东西。我们对那些思想晦暗不明，空洞无内容的文章，往往是如此的厌倦，以致于我们可以忽视隐含在文章下夸大的自我主义。我们看他的文章时，却惊异于亲切的考泽 (Causeur) 是如此深知我们的心；而我们是如此地感到慰藉，因为我们发现，如此的一位智者也分担了我们的错误，并且都为他所解决

了。当我们看到他也有不知，也有犹疑的时候，可以此自慰；当他述说道，我们的无知一经认知，也会变成哲学，这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在圣·巴托罗缪事件后，我们能碰上如此一位不具破坏性的人，那真是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总之，不管他对理性所做的攻击如何，我们发觉，他使法国的理性时代萌芽，正如培根在英国所做的一样。蒙田——一位理性主义的评论家——如非理性本身，他什么也不是。为着他对教会的敬意，这位非理性的人深具理性。只当他在法国人的心中播下理性的种子后，他才答应妥协。而且假如他（像培根一样）试着不去扰乱穷人赖以慰藉的信仰，我们就不应拿他的小心与仁慈来非难他。他不是生来就爱批评的人。他知道他也会有错，他是理性与中庸主义的布道者。他是如此的一位绅士，除非已有栖身之处给人，否则他是不会放火的。他的修养比伏尔泰更加深厚，因为他同情那些被他摧毁的东西。

吉本认为“在那个固执己见的年代里，在法国只有两位自由人士（有自由且宽宏的思想）例外，他们是亨利四世和蒙田。”^⑩而一向以帕斯卡眼光冷眼看着蒙田的圣·伯夫，^⑪最后也爆出罕有的热心，宣称他是：“前所未有的最有智慧的法国人。”^⑫

第四节 不朽人物

蒙田以后，法国文学整整有一个世代毫无发展。它几乎成功地逃过了宗教战争的灾祸，一直冬眠到战事过去。但另一方面，一些好战的宗教狂热却摧毁着法国的文学。正好像英国文学在内战后，落在法国之后一样，在蒙田到高乃依之间，法国文学亦遥遥地落在英国、西班牙后面。一个接一个气体状的彗星，曳过了穹苍，没留下一个固定而永恒的星星。政治家黎塞留曾试着用恩俸养士，却以检

查制度来妨碍它，并使它沦为对他个人歌功颂德的工具。他死后，此种恩俸制度就被路易十三轻松地一笔勾销：“我们不想再受到它的困扰。”此外，予法国文学以更大刺激的有朗布耶厅的著作家协会及黎塞留所创设的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

这个学院始终聚集学者与作家在康拉德的私宅中，他是国王的秘书（1627年）。黎塞留不但注意战争，也注意到文学，他羡慕意大利的学院和西班牙的文学，建议组成一个为国家所承认的研究团体。有些人反对他的计划，而视之为对传统的贿赂。但诗人沙普兰，一位枢机主教的养士，发出了如下的警语：“与他们打交道的这个人是要得到什么，就一定要得到的（指黎塞留）。"^⑩沙普兰的警告发生了效果，最后他们同意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且将这个团体编入了法兰西学院（1635年）。在它的规章里宣称道：

除了将我们所说的语言，从南蛮缺舌之列提升出来以外，否则要寻求国家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能一直留意的话，它已经比现存的任何语言都要完美，最后甚且可能媲美于拉丁文，就好像拉丁文曾和希腊文比美一样。院士的职责是净化语言，使它们免于过去已沾染过的衰读，不管是出自庶民之口，或法庭中的群众……或那些无知的谄媚者。^⑪

最初30位会员之一的沃热拉被委以编纂辞典的工作，在它第一版发行前（1694年），整整56年的光阴已如水逝去了。同时，学院方面也提升了学者们的地位，能当上40位“不朽人物”（Immortals）中的一个，就如同在政府中居高位一般光荣。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这样尊崇文学的。这个大多由老者组成的学院，时常像保守的制动板一般，限制了文学与语言的进展，且有时闭门不纳一些天才之人（如莫里哀、卢梭）；但它却能超出党派之外，要它的会员诚恳地接纳不同的意见。法国给予它的是恒久与不变，使它能在大多数都被摧毁的改变中，屹立不移。

聚集了诗人和学者后，黎塞留把他像猎鹰的眼光投向了新闻记者，1631年5月，西奥弗拉斯特·雷那多特（Théophraste Renaudot）靠枢机主教的帮助，发行了法国的第一份报纸，后来名之为《法兰西报》（Gazette de France）。每周出版一次，每次8大张，刊登经黎塞留同意发布或提供的官方消息，此外它还增辟了一般新闻（Nouvelles Ordinaires）的篇幅。路易十三为经常的投稿人之一。在这份报纸中，他答覆一些对政府的批评，并为他放逐母亲的事辩护。有时他还亲自送来自己的文章，并监督它们排成铅字；即使一位国王，都会因自己的文章被付印而雀跃。从此法国的印刷事业成了宣传的工具——在这里是意味着，向少数能阅读的人解释政府的政策。人们很快的就不再信任《法兰西报》，他们宁可在街头，买那些由枢机主教的政敌所出版的嘲弄性文章。

在那一年代里，最畅销的是罗曼史之类的作品。那些武士风范的风流艳史慢慢过时了，不只是塞万提斯和其他人的嘲讽，而是因为封建制度，屈服于王室之下，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权益和威望。那些花一般的武士们的故事，也已渐渐地为欲望受到压抑而形成的苦闷的罗曼史所取代。在路易十三的年代里，每一位悠闲而具有文学素养的人都读霍诺里·乌尔费（Honoré d'Urfé）的《阿斯特莉》（The Astrée）（1610—1619）。爱情的创伤激发作者的天赋。他的妻子，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做戴安娜（Dianna），她喜欢逐猎式的性爱甚于婚姻式者。她和她的狗一起用餐和睡觉，她几乎每年都需要堕一次胎。^⑩后来，霍诺里（Honoré）退隐到他的家园，写一些像田园派罗曼史一般的自传，来掩饰他的悲哀。他发现这对他的创痛有非常令人满意的弥补作用，所以他把它加长至5500页，在1610到1627年分5巨册陆续出版。在描写牧羊人塞拉丹（Céladon）与牧羊女阿斯特莉（Astrée）的爱情故事里，我们听到了蒙特马约尔的《戴安娜》、以及桑那沙罗和西德尼（Sidney）的《阿卡迪亚斯》（Arcadias）冗长的反响。这种反响是和谐而美妙的，牧羊人和牧羊女都有着法国宫廷的温文与优雅，描写的文笔足可达到著作家协会的要求，叙述情节的婉转绮丽，比之亨利四世的恋史毫不逊色，其

对女人的敬慕，更使那些专制造纯情派情史的沙龙女神愉悦。从此，这股活泉先后涌出了斯居黛丽夫人、阿比·普雷沃（Abbé Prévost，即 Anoine Prévost d'Exiles）、萨默·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及卢梭等的感情派罗曼史——他们都承认，在他们的大半生中，几乎每年看一次该书。几乎整整一世纪，法国、德国、波兰宫廷中的贵族和仕女，都在玩着阿斯特莉（L'Astrée）同样的爱情游戏；而大半的法国散文的沃野，都在耕耘着罗曼史。

另一半包括巴尔扎克的“书信”在内的作品，则是一些值得纪念的散文，是真正好的论文，它想予人对“矫揉造作”有深刻的印象，并和沃热拉及马莱伯一同负起净化文学、及为法国散文塑造古典形式与伦理的责任……布兰董姆离开了愉快的朝廷和军队生活后，到他死时（1614年），留下了一束传记，他很艺术且风趣地描述法国仕女的爱情，凯萨琳·美第奇的美德，玛丽·斯图亚特的美丽，华洛瓦的玛格丽特的机智；很可惜他这些迷人的故事都无法予以证实。他认为：“拘泥于一个圈子里过活并不是好事，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曾如此做过；一个人必须大胆的在各方面冒险，在战场上如此，在爱情上亦是如此。”在他的智慧达到更圆熟时，他认清了：“上帝给我们婚姻最佳的祝福，是姣好的后代，而非乐享齐人之福。”…亨利四世的朋友，国家参议员及法官迪图，曾帮着草拟《南特诏书》，并花上他大半生的时间，写了《生涯历史》（*Historia sui Temporis*, 1604—1608年），此书以其学识、公正、及指控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之爆发”的勇气而闻名于世。索利公爵也在他的晚年，得秘书之助，写成著名的作品——（*Mémoires des sages etroyales économies domestique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 de Henri le Grand*）——他以此书奉献给“法国，所有的好战士及法国人民”……在法王路易十三治下的最后一年，一个由让·博兰德（Jean de Bolland）所领导的弗兰德斯耶稣会会员的团体，开始发行《阿科塔·桑科托鲁姆》（*Acta Sanctorum*），叙述那些依照天主教教条起居的圣徒们的生活方式，并夹以审慎的批评。虽然耶稣会一再变迁，但他们这种工作一直进行着，到1910年已发行了65册。一些宗教叛

子曾提出了他们的抗议，但此种工作却一直被教会认作最有学术意义的探讨，而继续不辍。最后，我们还须提一下那无处不插一手，而又不可思议的黎塞留。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他的文采，并传下了著名的回忆录——虽然这个回忆录稍微偏袒了枢机主教，但却在那些无可匹敌的法国回忆录中，享有极高的评价。

无足轻重的诗人在此时充斥了整个法国。西奥菲尔·维奥（Théophile de Viau），文森特·沃图里（Vincent Voiture），及霍诺拉特·布埃尔（Honorat de Bueil）（即拉坎（Racan）侯爵）等人的作品，至今仍然被一些忠实的法国人阅读着，即使说仅在学校里。西奥菲尔（Théophile）放荡不拘的爱和诽谤性的刁疑，使他成为当代的维永（Villon），他因而招致被判火刑，但后来改为放逐。沃图里（Voiture）如春风般的机智，使他变成了朗布耶沙龙里的最佳的讽言家（Bel Esprit）。当波舒哀年仅12岁就在该沙龙中作午夜布道时，沃图里（Voiture）幽默地称之为“从未听过的，最早也是最晚的传道”。

在那个时代，出了两位闪闪发光的诗人。其中，马莱伯阐述了“每一个时代，如要使它别具风格，必须指摘与推翻过去”的原则。伟大的龙萨在马莱伯年轻时仍活着，他和他的普莱亚迪（Pléiade）曾使法国诗走向古典的模式和主题；然而他们的接棒人，日后却钻研于十四行诗；而他们的一些情妇则沉湎于古代的语法，新奇的句型，意大利式的理解力，笨拙的倒装句，隐晦的暗示和奥秘的神话。马莱伯崛起后，认为这些已经够了，是该停止的时候了。他在1555年生于康尼（Caen），在巴塞尔和海得堡（Heidelberg）求过学，并曾花数年时间游历各处。当他被网罗入法国朝廷时，已年届50。虽然他表现鲁莽而不恭，但他我行我素，成了亨利大帝（Henry the Great）眼中最宠信的诗人，亨利大帝所赐予他的“称颂比金钱多”。^④他卖诗给出高价的人，赖以维生，并撷取前人的精华，推广他本人的作品。就好像朗布耶沙龙的“矫揉造作”一般，他向那些乡野鄙里的及累赘冗长的文句提出挑战。他摒弃了那些倒装句法，暧昧的文句，口话文章，乡土文章，吹嘘文字（Gasconisms 对国王尤其刻

薄), 添凑语, 刺耳的音韵, 违反语法, 外来语, 拉丁语法, 专门用语, 诗的破格用法和不完全的韵律。他特别注重文章中思想的高尚, 表达的精简, 韵律的和谐, 譬喻的一致及叙述的条理和句法逻辑化。好的著作必须能诉说清晰, 并悦人耳目; 脱节(“一位历史家”)常造成一种听觉上的不适和呼吸上的不均匀。马莱伯就曾在仆役的耳边试过他诗句的韵律。^⑭

现在, 让我们来欣赏他的一首诗——《慰藉》(Consolation)——这是他为一位哀悼亡女的朋友所写的:

毕竟她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在这里, 最美好的事物总有着最悲惨的命运。

她, 一朵玫瑰

在晨曦里含苞待放……

但死神无处不咄咄逼人;

我们无望地向它祈祷,

它却掩塞双耳,

任我们哀号。

可怜的老人在他的茅屋里, 在茸草屋顶之下,

无言地服从了它的定命;

然而, 即便是看守卢浮宫大门的卫士

亦不能阻止他亲近吾王的心愿。^⑮

马莱伯的原则, 似乎比他的实际作为, 予人以更强烈的印象。他的诗从他的原则里, 感染了冷漠的气氛; 当代从事散文改革的巴尔扎克就曾指出, 在马莱伯的诗中, 他只见到优美的散文。虽然马莱伯是一位注重原则而不重实际的人物, 但是朗布耶沙龙仍把他当作该组织的核心, 学院也承受了他的箴言, 而布瓦洛甚且将这些箴言当作古典风格的基础。它们在往后二世纪中, 变成了法国抒情诗人所披着坚毅而高尚的外衣。在那过去的年代里, 马莱伯渐渐地成为了诗宗, 及解决文学风格及语言疑难的哲人。一些崇拜者, 称颂他

是“空前伟大的雄辩家”，而且他也同意。“马莱伯的作品将永垂不朽。”^⑭在他垂死的病榻前（1628年），他甚至于不忘从最后一次昏迷中醒来，为了谴责护士的用词不当。^⑮

马苏林·雷尼耶（Mathurin Régnier）认为马莱伯是惹人生厌的人，他忽视马莱伯的原则，且像维永一样，作一些无病呻吟的小诗。他在尼斯堡（Venusberg）削发为僧时，是如此的迷惘，以致年纪轻轻的他，看起来已非常苍老。31岁时，他因染上了痛风和梅毒，而显得孱弱不堪。他仍认为“每一个女人均为我喜爱”，只不过她们越来越挑剔而已。他写了些法国文学上最具力量的诗，鲁莽的性爱、残酷的讽刺是它们的特色，几乎可与贺拉斯的格调、朱文诺尔（Juvenal）的醋意相匹敌，其中穿插着他所见所觉的人或地，益见生动。他嘲笑“矫揉造作”、纯洁不邪的诗句和马莱伯严谨的古典作品。从内心所发出的热情，比之传统的文法、修辞学及韵律学，赋予他的诗更多的养份和生命。在这古典主义刚兴起的时刻，浪漫主义又激起了它的浪花。即使是科学与哲学，都不免因自我吹擂，而遭到雷尼耶的攻击：

做着梦的哲学家呀！

你们趾高气昂地谈论着——像小孩子一般；

你们不能从地球跳到另一个星辰；

却要使整个穹苍随着你们的韵律舞动，

用宇宙的尺度，衡量你们的论述……

你们提着一盏小灯，

走向深不可测的大自然；

你们说你们因而知道了花儿色彩的故事……

描述着天国与地球的奥秘；

啊！

你们的理智欺骗了你们，

正如你们的眼睛一样。^⑯

1609年，他成了亨利四世的宫廷诗人。4年后，他因纵欲过度而死，享年39岁，死前他曾自拟了墓志铭：

我活着，不带一点思想，
依照自然美妙的法则，
逍遥自在地过了一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死神会记起了我，
我可不管纡尊降贵去想起她。^⑧

第五节 皮埃尔·高乃依

(公元1606—1684年)

高乃依是黎塞留时代的文学巨子，他使得法国戏剧成为文学，而且在以后的一世纪里，戏剧成为法国文学的主流。

在他之前，已经有了许多试验，在1552年埃丁尼·乔德尔(Etienne Jodelle)上演第一出法国的悲剧。模仿塞尼加的悲剧也继之而起。它根据塞尼加的架构，包括有暴力、心理分析及华丽的辞藻，但是除去了古典式的合唱，而被套入所谓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之中，即剧中唯一的情节是在一天之内在同一地发生的。亚里士多德（如同我们在讨论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时提到的）只要求情节的统一而未要求地域的统一，他不坚持时间的统一。不过博学的斯卡利杰尔·朱利阿斯在他《诗论》(Poetices libri septem, 1561年)一书中，却要求所有戏剧家遵循希腊、拉丁的形式。沙普兰在1630年重复此要求，然此一争论在英国因一位既拙于拉丁文又不精希腊文、乡野天才的兴起而失败了。在继承拉丁语文及文化的法国，却获得全面的胜利。1640年后，塞尼加三一律的形式在法国悲剧舞台上，历高乃依和拉辛，经伏尔泰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帝国复辟把持了法国上演的悲剧，直至维克利·雨果(Victor Hugo)的《赫纳尼》

(Hernani) (1830年), 此浪漫剧赢得其历史性的迟来的胜利。在16世纪, 法国的戏剧上演并无定所, 而系寄托于学院且需奔波于宫廷与宫廷、厅堂与厅堂之间演出。在1598年第一家永久性法国剧场建于莫肯塞尔(Mauconseil)街的博格尼(Bourgogne)旅馆。在1600年又有马亚斯(Marais)剧院于现在的维埃尔的寺庙(Vieille du Temple)街开幕。此二者的形式均是中央一长形的场地, 较低下之阶级站着, 一面吃、赌、吵, 一面欣赏剧情的进展。沿着墙壁是两排包厢, 专供有钱的士绅使用。在黎塞留朝代以前, 仅有一些邈远的妇女跑跑龙套地参与演出, 舞台位于长方形的一端, 由于距离观众太远, 以致演员们根本不需面部表情来传达感觉和思想, 只要放大音量以使远处观众能够听得见。演出时间都是在下午, 通常在5点到7点左右, 由于此二家剧院皆处于危险地区, 因此法律规定演出必须在天黑前结束。在莫里哀以前, 演员大部分是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 其时女角色均由女人担任; 同时更为了增加剧院的收入, 特别在喜剧中对“性”做夸大的强调。教会和议院曾尝试净化或压抑喜剧, 但均无成效。黎塞留一方面资助及监督剧作家, 一方面自己亲临观赏演出, 又和罗特劳(Rotrou)、斯卡龙等剧作家合作写剧本, 因而提高了法国戏剧的道德水准。逐渐地在他全面督促下, 高乃依的先驱者——加理尔(Garnier), 哈迪(Hardy)和罗特鲁(Rotru)——替《李·奇德》(Le Cid)成功的新纪元铺下了坦平之途。

高乃依在成名之前也曾经历过一段艰辛的日子。他于1606年生于卢昂, 生长在这个小省会里, 使他接触不到巴黎的文学气氛和文学研讨机会。但他的父亲是一个颇有地位的法官, 能供给高乃依上当地最好的耶稣学院。在这里, 那些热心的教育学者, 把戏剧当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 教导学生们去扮演拉丁、古典或其他的戏剧, 这种耶稣会训练影响了法国戏剧的主题、技巧与风格。当然无人期望高乃依成为一位剧作家, 他受的是法律的训练, 且曾开业一段时间, 而雄辩的艺术及习惯对他日后悲剧中铿锵言辞多少是有些作用。

21岁那年, 差不多是同时, 他陷入爱情与诗的漩涡中, 但他的

爱遭到拒绝，只好在韵律中寻求慰藉。受了这次创伤，很长一段时间他变得抑郁而胆怯，把对爱情的向往寄诸戏剧写作之中。11年后，他才找到一位妻子——还是经由黎塞留的帮忙，但在同时，他构思了一打的悲剧、爱情喜剧和英雄豪侠剧。1629年他到巴黎发表了他第一出戏剧《梅利特》(Mélite)而在博格尼(Bourgo-gne)旅馆的剧院上演，此剧是描写爱与风流艳事的荒谬事迹，但是它生动的对话，使此剧大大地成功，高乃依陶醉在成名的喜悦里。黎塞留要他和另外4个剧作家根据枢机主教建议的题目和结构写他们的剧本，但高乃依不甘被局限在这狭小的范围里，因而触怒了枢机主教。盛怒之下，他回到卢昂，可是此后他仍继续支领黎塞留每年500银币的恩俸。

由于为麦雷特(Mairet)的悲剧《索福尼斯比》(Sophonisbe)的演出成功所激励，他放弃了喜剧，转而研究塞尼加的悲剧，而且在1635年在巴黎发表他的作品《美迪》(Médée)。此剧中，他首次表露他基本的特质——有力的思想和高贵的言辞。此后他塑造的舞台人物虽然仍不免稍有瑕疵，都是很有地位的绅士淑女，充满着高尚的情操，而这一切所赖以表达的则是华丽的言辞，及有力的推理。同时代的英国诗人瓦勒(Waller)，听了《美迪》(Médée)之后，喜见一位新的艺术大师之出现。他说：“别人……作诗，高乃依则是唯一具有思想的剧作家。”^⑩最高的艺术是隐含着哲学的艺术，从罗马及希腊英雄剧里，由于他受耶稣会牧师的影响，及他本身特有的忧郁和孤独的沉思——壮丽的亚历山大诗行，在其梦际即已成型——高乃依成就了法国戏剧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及风格水准，不仅前所未有，此后亦不常见。

此外，他还受着另一种戏剧文学的吸引和影响，他由伊丽莎白时代戏剧获得的启示很少，因其太忽略古典法则，无法投合他古典的思想形态。但这时，西班牙方热衷于戏剧，并极力推崇韦加及狄尔索、卡尔德隆等人，誉为自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及特伦斯(Terence)及塞尼加以来悲剧唯一的承继者。在西班牙的戏剧里高乃依发现一个自然的戏剧主题——即荣誉规范要求面临侮辱或诱惑

时必须以死亡做为结束。他学习西班牙语，阅读卡斯特罗的《拉斯·莫切达迪·奇德》(Las Mocedades del Cid) (1599年?)，和莎士比亚一样毫不客气地借用情节，写成了法国文学上最著名的戏剧。

《李·奇德》(Le Cid) 于1636年演出，观众们觉得在高卢的舞台上从未上演过如此生动有力的戏剧。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它是如此美，即使是最冷酷无情的妇女，也亢奋不已，她们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在公共剧院中任由感情奔放。那些平日很少离开他们金碧辉煌的大厅及雕着鸢尾花的靠臂椅的人，也出现在包厢里”。^⑧很少人知道这些情节是借来的，虽然高乃依坦白地承认，大家都惊异于错综复杂的微妙情节。出身高贵的奇米尼(Chimène)与贵族罗德里格(Rodrigue)深深地爱恋着对方。但是奇米尼(Chimène)的父亲唐·戈梅斯(Don Gomès)与罗德里格(Rodrigue)年老多病的父亲吵起来，并且侮辱了他。罗德里格(Rodrigue)在荣誉心的驱使下，觉得他应该为他的父亲报仇，遂向唐·戈梅斯(Gomes)挑战并把他杀死。而奇米尼(Chimène)虽仍深爱着罗德里格(Rodrigue)，却决心请求费南德(Fernand)国王将罗德里格(Rodrigue)驱逐或斩首。荣誉与爱情的冲突，使故事和她复杂的情感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力量。罗德里格(Rodrigue)将自己的宝剑献给奇米尼(Chimène)，并请她杀死他，但她迟迟不忍下手。他乃离她而去，与摩尔人作战，却拖着掳获的国王与如云的荣誉回到了赛维尔，所有赛维尔人均歌颂着他的名字。然而奇米尼(Chimène)仍祈求他的死亡，当费南德(Fernand)国王拒绝了她的请求之后，她发誓将委身于任何能将她所爱的人杀死之人。而桑乔(Sancho)接下这份工作，罗德里格(Rodrigue)愿意死在桑乔(Sancho)手下。但奇米尼(Chimène)懊悔她的报复行为，哀求他防御自己，最后他制服了桑乔(Sancho)，但赦免了他，结果荣誉规范获得满足，奇米尼(Chimène)接受了他的爱，一切皆大欢喜。

有半季之久，巴黎赞美奇米尼(Chimène)的美，并为她这样做是否明智辩论着。政客性的高调四处可闻，黎塞留已禁止决斗，而此剧中决斗似乎仍是最高法律的一部分。憎恨黎塞留的贵族们，以

此剧表现了自掌法律的贵族政治而感到光荣。枢机主教因高乃依曾拒绝接受其文学指导，对他这次的成功觉得索然无味。他要求他新成立的学院就此剧发表一篇公正的评论，而且毫不隐瞒他的意愿——即对此剧做不利的批判。学院延长讨论，以使火爆气息冷却。最后，经过了5个月，他出版了《观点》一书，总之此批判是适度而公正的。它显然反对赞扬罗曼蒂克的爱情，它认为结局缺乏真实感，而且又认为奇米尼(Chimène)在罗德里格(Rodrigue)与桑乔(Sancho)交战前向罗德里格(Rodrigue)最后所说的话不合适且荒谬空洞。即“待你胜利归来，奇米尼(Chimène)即作为你的战利品”。但是学会很漂亮地以一段结论缓和了以上的批评“即使是博学之士也应该原有一部作品的逸出常轨，它能引起社会的共鸣，必有其特殊的美……而且其热情的自然及激烈，思绪的有力和微妙，和混合着瑕疵的一种无以描述的魔力，这些使它在同类的法国诗中获得很高的评价”。^⑩

学院以后也不再从事文学批判的工作，高乃依为了缓和这种情势，将已出版的《奇德》(Cid)献给枢机主教的爱侄，并将他下一部杰作《贺拉斯》(Horace, 1640年)呈献给枢机主教。李维(Livy)^⑪在《历史》一书中提到这段传奇，在同一天，二个不同的城市里，一对孪生姐妹各生了三胞胎的男孩。一对的父亲是罗马的霍拉修斯(Horatius)，另一对的父亲是阿尔巴·朗加(Alba Longa)的克里亚图斯(Curiatus)。一世代之后，此二家族又以克里亚图斯(Curiatus)的女儿萨比娜(Sabina)与霍拉修斯(Horatius)的儿子贺拉斯联姻，以及霍拉修斯(Horatius)的女儿卡米拉(Camilla)与克里亚蒂(Curiati)的三胞兄弟之一缔婚而更结成亲家。

但是那时此二城市正浴于血战中，两军正面交战。卡米拉(Camilla)与萨比娜(Sabina)在罗马的军营极度骇怕，因而萨比娜(Sabina)就写出了充满以女性为主题的作品：

吾为罗马人！啊！因为贺拉斯是罗马人！

自结缡以来，我得此名衔，但如果我因此而不得再见